

郭松齡事件新探

鄭智文

摘 要

1925 年 11 月底，奉軍將領郭松齡率部從山海關回師瀋陽，企圖推翻張作霖在東三省的統治。一個月後，郭軍於遼河戰敗，郭氏被殺。郭氏之敗，論者多歸咎於日本關東軍的干預。本文將以中、日、英、蘇等國的檔案史料為基礎，探討日、蘇兩國在郭松齡事件的背景、成因和經過，以及日、蘇兩國在此事件中的角色，並重新檢視雙方勝負原委。本文認為，雖然日、蘇直接干涉事件，但郭軍戰略失誤和實際戰鬥對結果的影響實不可忽視。

關鍵詞：軍閥、郭松齡、奉系、張作霖、關東軍

The Guo Songling Incident of 1925 Revisited

Chi Man Kwong^{*}

Abstract

In November 1925, Guo Songling, the 60,000 strong men commander of the 3rd Army Group of the Fengtian Army, with a view to overthrowing the rule of Zhang Zuolin over the Chinese Northeast, suddenly marched back to Manchuria via Shanhaiguan from the China Proper. The attack was initially a success, with Guo's forces defeating the Jilin army near Lianshan on 5 December. However, when it was rumoured that Zhang Zuolin's regime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Guo's army was somehow reversely overrun near the Liao River between 22 and 24 December. Japanese intervention had long been seen as the main reason for Zhang Zuolin's unexpected victory. Nonetheless, as more and more sources from China,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in the recent years, there is a need to revisit the war, especially from geopolitical and military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warlord warfare during the 1920s in China by looking more closely at the role played by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and during the Guo Songling Incident. It also suggests that although Soviet and Japanese interventions were important, the military factors and strategic mistakes made by Guo himself were no less important.

Keywords: Warlord, Guo Songling, Fengtian Clique, Zhang Zuolin, Kwantung Army

^{*} Research Fellow,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郭松齡事件新探*

鄭智文**

壹、前言

在 1920 年代中期，民國政治中「內政與外交混一」的現象已成時人共識。《國聞周報》在 1924 第二次年直奉戰爭後的評論足可反映時人觀點：

民國十三年，戰亂相尋，殺戮無窮，百業凋敝，民不聊生。國人但知由於軍閥之攘權奪利，而不知尚有由於外人之競爭勢力；但知軍閥與軍閥相爭，而不知有某國與某國暗鬥；但見國內軍閥此起彼仆，而不知尚有外國勢力之互為消長……民國以前之痛史，無不因內亂而招外侮，民國以來之痛史，則因外交而致內亂不戢，復因內亂而外侮迭來。¹

外國干涉中國政治的事例中，尤以 1923 年至 1927 年間蘇聯對中國的活動最為全面。從尋找盟友、輸入軍火、派遣顧問、鼓動宣傳、參與計畫，以至來華外交人員的活動，均以在華建立親蘇政權為目的。以 1925 年 11 月至 12 月間發生的郭松齡事件（日人稱為「張郭戰爭」）為例，雖然郭松齡與蘇聯無涉，但事件既是蘇聯在華活動的間接結果，亦為它在華北進行進一步干預提供便利。事件期間，在東北稱雄一時的奉系軍閥幾近覆滅。乘奉系內鬥之機，由馮玉祥領導，與蘇聯、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1 年 10 月 18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 年 3 月 5 日。

**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¹ 天生，〈外交與內亂〉，《國聞周報》，第 1 卷第 19 期（1924 年）。引文亦見楊天宏，〈北伐前夕中國政治中的外國因素〉，收入《政黨建置與民國政制走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266-267。

國民黨左派接近的國民軍占領京津、河南及山東部分地區，席捲華北。國共兩黨與國民軍行將推翻名存實亡的臨時執政府，成立一個西至中國西北、北至內蒙與東三省、東至渤海與華北海岸、南至湖北的親蘇政權，並與當時控制廣東的國民政府連成一氣。如郭軍獲勝，則 1926 至 1928 年的北伐可能不會發生。可是，正由於郭軍在遼河戰敗（又稱巨流河戰役），計畫終成畫餅。

郭軍戲劇性的失敗，在「內政與外交混一」的觀念下顯然是與蘇聯為敵的日本干預之結果。不但國人作如是想，美國公使館參贊麥耶（Ferdinand Mayer）評論張馮衝突時，亦認為「蘇日才是華北控制權的競爭者」，把戰爭看成日、蘇兩國的代理戰爭（proxy war）。² 此後，有關此役的研究，例如麥科馬克（Gavan McCormack）《張作霖在中國東北》（1977 年）、司馬桑敦（王光逖）《張老帥與張少帥》（1984 年）、毛覆平、王關興〈論郭松齡事變的性質及其失敗的原因〉（1982 年）、張安慶〈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初探〉（1983 年）、顧明義〈郭松齡事件與日本〉（1986 年）、丘權政〈郭松齡聯合馮玉祥倒戈反奉及其失敗〉（1989 年）、高紅霞〈郭松齡倒戈失敗剖析〉（1987 年）、萬家星〈為郭松齡辯〉（1999 年）、季鵬〈日本幣原對華外交與郭松齡事件〉（2006 年）等，³ 均集中討論日本在事件中之角色、駐滿機構之行動，以及事件起因和性質等問題，並以事件是否權力之爭分成兩大陣營。⁴ 至於郭軍失敗原因，論者多歸咎日本干涉，只有高紅霞認為郭松齡

² “The Chargé in China (May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5/1925, i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25, Vol. 1, p. 610.

³ Gavan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Folkstone, Kent: Dawson, 1977)；司馬桑敦等，《張老帥與張少帥》（臺北：傳記文學，1984 年），頁 29-34；毛覆平、王關興，〈郭松齡事變的性質及其失敗的原因〉，《學術月刊》，第 5 期（1982 年），頁 70-76；張安慶，〈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初探〉，《武漢大學學報》，第 4 期（1983 年），頁 64-70；杜尚俠，〈試談郭松齡反奉的性質〉，《東北地方史研究》，第 3 期（1985 年）；顧明義，〈郭松齡事件與日本〉，《日本研究》，第 4 期（1986 年），頁 48-50；高紅霞，〈郭松齡倒戈失敗剖析〉，《學術月刊》，第 12 期（1987 年），頁 73-76；丘權政，〈郭松齡聯合馮玉祥倒戈反奉及其失敗〉，《東北地方史研究》，第 2 期（1989 年），頁 118-131；王雅文，〈郭松齡與張氏父子〉，《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1995 年），頁 29-31；萬家星，〈為郭松齡辯〉，《社會科學戰線》，第 3 期（1999 年），頁 166-171；季鵬，〈日本幣原對華外交與郭松齡事件〉，《民國檔案》，第 4 期（2006 年），頁 59-63。

⁴ 張薔薔，〈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軍事史研究綜述〉，《軍事歷史研究》，第

過分自信、郭軍內部鬆散、拒絕與馮玉祥合作等因素比日援重要。⁵ 至於蘇聯在事件中的角色，則仍有待梳理。

前人研究多引用日本外務省和中國方面的史料，如外務省文書，以及當事人如齊世英、郭大鳴、魏益三等人的回憶。在時段方面，前人研究多集中討論各方在事件期間的動作，少有把郭松齡事件置於 1925 年中國政局的背景中討論。本文擬利用新近發現及已被廣泛利用的中國文史資料（如《郭松齡反奉見聞》）⁶、蘇聯檔案資料（如《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⁷、日、英、美等國的外交資料，以及日本關東軍參謀部在 1926 年 3 月完成的「張郭兩軍作戰經過」及「張郭戰爭中有關支那軍隊的諸觀察及有關本戰亂的諸問題」兩份報告。⁸ 最後兩報告是民國時期中極為罕見的詳細紀錄，為研究郭松齡事件提供全新視角和資料。本文通過對照多國資料，務求詳析日、蘇兩國與 1925 年郭松齡事件的關係，以及兩國在郭軍戰敗中的角色。

本文將分為三個主要部分：（一）日蘇對華政策與郭松齡事件的緣起；（二）事件期間日蘇雙方之具體行動；（三）日蘇干涉的實際影響與郭軍失敗原因。

2 期（2003 年），頁 176-185。

⁵ 顧明義，〈郭松齡事件與日本〉；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季鵬，〈日本幣原對華外交與郭松齡事件〉；Gavan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p. 184；高紅霞，〈郭松齡倒戈失敗剖析〉。

⁶ 姚東藩等，《郭松齡反奉見聞》（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⁷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0-1925》（下稱《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北京：北京圖書館，1997 年）。楊雨青曾以此史料詳寫國民軍在 1925 年和蘇聯的關係。見楊雨青，〈國民軍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近代史研究》，第 3 期（2003 年），頁 117-133。

⁸ 「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陸軍省大日記》，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以下簡稱 JACAR），檔號：C03022778300；「張郭戰二於ケル支那軍隊ニ關スル諸觀察並本戰亂ニ關スル聯諸問題」（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貳、郭松齡事件的時代背景

一、1920 年代中期日、蘇東北亞政策

1920 年起，蘇聯開始尋求在華盟友，以求輸出革命、穩住東疆、控制外蒙，並延續沙俄時代的利益（如領事館及中東鐵路），期間先後和吳佩孚、張作霖和國民黨接觸，最後於 1923 年 1 月與國民黨成為盟友。⁹ 1924 至 1926 年間，蘇聯對華北政局干預甚力，其中以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為首的外交代表和顧問更於 1925 年嘗試在北京建立一個由國民黨左派、馮玉祥和吳佩孚勢力組成的親蘇政權。此過程即為郭松齡事件之背景。

1924 年 8 月，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派兵入侵浙江，江浙戰爭爆發。奉軍為聲援浙盧，於 9 月中與直軍開戰，引發第二次直奉戰爭。10 月 23 日，藉直、奉兩軍在山海關膠著之際，直軍第三軍司令馮玉祥履行與張作霖和段祺瑞訂下的密約，率兵由熱河回京，挾持總統曹錕，改稱所部為國民軍。¹⁰ 馮入京後，企圖拋開奉、皖兩系，委任黃郛內閣，但不為列強和盤據華中的直系殘黨承認。組閣失敗後，馮即邀孫中山上京共組政府。¹¹ 同時，奉軍張宗昌、李景林部在灤州擊潰直軍後，迅速進軍京、津。馮氏為保存實力，即同意與張、段合作，組織由段氏

⁹ 楊雨青，〈國家利益：蘇俄對在華合作者的選擇〉，《歷史研究》，第 4 期（1999 年），頁 141-142；耿雲志，〈吳佩孚與蘇聯及北京知識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89-98；水野明著，鄭樑生譯，《東北軍閥政權研究：張作霖、張學良之抗外與協助統一國內的軌跡》（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頁 122-124。

¹⁰ 有關第二次直奉戰爭，見 Arthur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Kwong Chi Man, "Character and Circumstances: Wu Peifu and the Second Zhili-Fengtian War," (M.Phi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8).

¹¹ "Sir R. Macleay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29/11/1924, in Robert L. Jarman,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CPR), Vol. 5,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2001), p. 102；劉曼蓉，〈孫中山「中央革命」計畫與馮玉祥北京政變〉，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1403。

出任「執政」的「臨時執政府」。自此，馮玉祥及國民軍在華北政治中變得舉足輕重。

蘇聯因其地緣政治與全球戰略關係，採取了聯合國民軍，並使之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北京政變後，鮑羅廷和加拉罕均認為國民軍將是國民黨的北方盟友。¹² 1925年9月，加拉罕在莫斯科舉行的俄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上聲言，蘇聯的目標是支持廣東政府，並在北京建立國民黨政權。¹³ 蘇聯以援助國民軍，將其「吸引到（由共產國際控制的）國民黨左派方面」，並把蘇聯在華南（國民黨）和華北（國民軍）的盟友聯結起來，建立一個控制範圍自中國西北至沿海地區的親蘇政權。按蘇聯的戰略構想，如中國革命成功，勢將影響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打擊其頭號敵人英帝國，為蘇聯贏得時間與空間以鞏固內部。¹⁴ 為回應華北局勢變化，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在1924年12月成立北方局，而俄共中央政治委員會則於1925年3月成立了「中國委員會」，以「監督平時對國民黨及其同情團體進行援助的執行狀況」，指導蘇聯在華盟友。¹⁵

至於日本，蘇聯則於直奉戰後以懷柔手段與之瓜分東三省利益。加拉罕與北京、奉天簽訂協議不久，趁中國內部混亂之際，與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在1925年1月簽訂協議，表面上為恢復貿易與外交關係，實則重新確認1905年「樸次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承認蘇俄可以繼承沙俄在北滿的勢力範圍，而日本在南滿利益亦獲蘇聯承認。¹⁶ 至此，日、蘇中央政府在東北問題上已有初步諒解，無疑令張作霖在東三省更為孤立。

¹² 「鮑羅廷關於國民黨的書面報告」（1925年1月24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566。

¹³ 「『カラハン』ノ支那ニ關スル報告送附ノ件」（1925年10月6日），〈各國內政關係雜誌（下稱「各國」）／支那之部〉，第36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060100，微捲號：180-182。

¹⁴ John Erickso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1918-1941*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 238.

¹⁵ 引自薛衡天、金東吉，《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1917-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頁144、145。

¹⁶ Bruce A. Elleman,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7* (Armonk, N.Y.; London: M.E. Sharpe, 1998), p. 132.

二、1924 年直奉戰爭後蘇聯扶植馮玉祥

為對抗奉系，國民軍向蘇聯求助。經李大釗和國民黨左派的徐謙牽線，馮玉祥於 1924 年 10 月底已開始與蘇聯接洽；12 月底，國民二軍領袖胡景翼經李介紹，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討論合作問題。¹⁷ 當時，國民軍已有意再次發動政變，蘇方更同意於國民軍發動時，向東三省北部邊境派兵牽制奉張。奉張從英國駐京武官得悉馮軍密謀後，即匆匆離京，並視國民軍為心腹大患。¹⁸

1925 年間，國民軍在蘇聯支持下不斷擴充勢力。2 月，當執政府舉行善後會議時，蘇聯向胡景翼派出軍事顧問，建議胡入主陝西，以保障他和蘇聯（經陝西—綏遠出口）及馮玉祥的聯絡。胡即無視執政府停戰令，攻擊盤踞洛陽的憨玉琨和劉鎮華，占領河南全省及陝西省部分。3 月，俄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國委員會成員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伏龍芝的建議，決定協助國民軍在洛陽和張家口建立軍校，並提供顧問、教官，以及武器。¹⁹ 據蘇聯中央政治局資料，除以茶葉、棉花等貨物交換外，馮氏又答應在國民軍、外蒙古和蘇聯之間「訂立三方友好互助口頭協議，作出關於接受（蘇聯）對蒙古的計畫和關於在（馮）的勢力範圍內向外國人提供任何租界的單方面書面保證。」²⁰ 自 1925 年初至 10 月，國民軍由二師四旅，近 4 萬人的規模，發展成接近 30 萬人的龐大軍隊。²¹ 至 1926 年中，國民

¹⁷ 薛衡天、金東吉，《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1917-1949》，頁 144；劉敬忠，《國民軍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11、114-116、118。

¹⁸ 「張弧の時局談の件」（1925 年 1 月 8 日），〈各國／支那之部〉，第 34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056500，微捲號：20；“Sir R. Macleay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31/12/1924, CPR, p. 107.

¹⁹ 援馮武器於 3 月開始運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 52 號記錄」（1925 年 3 月 13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582-583；“The Chargé in China (May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5/1925, FRUS, 1925, Vol. 1, p. 609.

²⁰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 1 號報告」（1925 年 4 月 17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603；「馮露關係」（1925 年 6 月 29 日），〈支那、蘇連邦外交關係雜纂〉，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2030818800，微捲號：575；楊雨青，〈國家利益：蘇俄對在華合作者的選擇〉，頁 129；「芳澤公使電」（1925 年 5 月 11 日），〈各國／支那之部〉，第 35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057900，微捲號：138。

²¹ 「北支那軍隊調查の件」（1925 年），〈密大日記—大正 14 年〉，第 5 冊，《陸軍省大日

軍從蘇聯最少獲得步槍 5 萬枝、各式火炮 60 門、機槍 230 挺，更有 40 名蘇聯顧問協助訓練馮部。²² 從數量看，在此期間國民軍比國民黨得到更多蘇援。除國民軍外，蘇聯亦根據其外蒙經驗，扶植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並為其組建騎兵軍，成為國民軍的後援。1925 年 8 月，莫斯科曾發現馮玉祥向日人示好，²³ 決定停止向其供應武器，但在加拉罕代其辯解，指馮的行動只是出於戰術需要後，蘇聯又繼續為馮提供武器。²⁴

三、蘇、馮反奉策略與奉張之應對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蘇之間愈見對立。1924 年 12 月，張作霖與孫中山會面時，據鮑羅廷報告，張氏向孫抱怨「蘇聯在中國奉行帝國主義政策」，不肯「歸還中東路和蒙古」，使孫對張頗為不滿。²⁵ 1925 年 3 月，加拉罕曾建議中央政治局考慮向奉張提供武器以攏絡之。²⁶ 可是，奉方拒絕在中東路問題讓步，而且奉

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31900；「北支那軍隊調査の件」（1925 年），〈密大日記—大正 14 年〉，第 5 冊，《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26600；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 年），頁 59-67；劉敬忠，《國民軍史綱》，頁 97-99。

²² “Sir R. Macleay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28/10/1925, in Kenneth Bourne and Cameron Watt,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FOCP), Part II, Series E, Vol. 30, p. 64; “Sir R. Macleay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31/10/1925, FOCP, Vol. 30, pp. 67-69; “Sir R. Macleay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24/11/1925, FOCP, Vol. 30, pp. 99-100; 楊雨青，〈國家利益：蘇俄對在華合作者的選擇〉，頁 129。

²³ “Sir R. Macleay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28/10/1925, FOCP, Vol. 30, p. 64.

²⁴ 「『カラハン』ノ支那ニ關スル報告送附ノ件」（1925 年 10 月 6 日），〈各國／支那之部〉，第 36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060100，微捲號：17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 8 號記錄」（1925 年 8 月 29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671。

²⁵ 「鮑羅廷關於國民黨的書面報告」（1925 年 1 月 24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568；遐庵年譜匯編印會編，《葉遐庵先生年譜》（上海：遐庵年譜匯編印會，1946 年），頁 217。

²⁶ “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Attitude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towards the leading Political Problems of the Day,” in “Mr. Hodgson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10/8/1925, FOCP, Vol. 29, pp. 348-351.

系張宗昌又與流亡在華的白軍勢力親近，此事因而告吹。

1925 年，張作霖成為希望控制北京的蘇聯及其中國盟友的打擊目標。甫一開始，分化奉軍已成蘇聯主要手段。中國委員會在 1925 年 3 月成立時，其中一項任務即為「瓦解聶洽耶夫部隊（即張宗昌旗下的舊帝俄傭兵）」。²⁷ 同年 6 月，俄共中央政治委員指示在華人員要「發動聲勢浩大的反張宣傳攻勢，千方百計分化瓦解他的軍隊並使之革命化。」²⁸ 至 8 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指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組建「革命武裝力量」，其「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之一」是「瓦解張作霖的部隊」。指示謂：

瓦解工作應當採用黨力所及的一切手段。其中最有力的手段是讓忠於我們的指揮人員和從事軍事部專門指令性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員打入敵人的軍隊……。為了節省力量，首先應當把分化瓦解工作集中在最重要的據點上，而就政治條件和戰略意圖而言，在這些據點裡特別重要的是爭取從軍事上瓦解敵人。²⁹

東方部又指示中共成立軍事部，以分化瓦解奉軍為首要目標；這些指示均獲得中央政治局的認可。³⁰ 9 月 28 日，距離郭松齡舉事兩月，中國委員會成立以特里利塞爾（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外國處處長）等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以「全面研究關於分化瓦解張作霖軍隊和這項工作所需的經費問題。」³¹ 30 日，中國委員會決定除撥款支援國民黨和國民一、二軍外，另外撥出 3,082,795 盧布的特別預算，「以備支援第三人民軍和預料不到的補充撥備之需」。這可能是準備資金予倒戈的奉軍將領。在同一會議中，有關援助中國盟友的總預算為 20,557,136

²⁷ 引自薛衡天、金東吉，《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1917-1949》，頁 144-145。

²⁸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 68 號（特字第 51 號）記錄」（1925 年 6 月 25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636。

²⁹ 「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草案」（1925 年 8 月 21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660。

³⁰ 「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草案」（1925 年 8 月 21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665。

³¹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 12 號記錄」（1925 年 9 月 28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686。

盧布。³² 8 月，中央政治局認為「鑑於張作霖和國民軍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因此）應在未來的衝突地區作好政治上的準備」。會議又決定國民軍應「同直隸集團建立聯繫，並要特別注意湖北和湖南」，而蘇方亦應對段祺瑞和國民軍「施加壓力，以便對張作霖實行更為積極的政策」。³³

早於 1925 年春，張作霖已開始察覺馮、蘇之盟，擔心執政府為馮所控制。胡、憨戰爭期間，張作霖會見英、美公使，聲言將把馮玉祥、胡景翼和孫岳三人趕出北京，希望各國給予道義上的支持。³⁴ 5 月初，關東廳長官兒玉秀雄與張會面，期間奉張透露他考慮赴京（張曾於 6 月至 8 月期間留津，當時盛傳他有自任總統的打算）的主因是擔心「馮玉祥與赤化問題」。³⁵ 同月，奉張與英國駐奉總領事偉晉頌（Frederick Wilkinson）會面時，更直指馮正與加拉罕聯手控制執政府。³⁶ 至 7 月間，奉系已深感馮、蘇同盟對東三省的壓力：奉系總參議楊宇霆判斷蘇聯可能對東三省用兵，擔心奉系兵力不足應付馮、蘇兩方面。³⁷

可是，奉張的「反赤」立場卻未獲英、日兩國同情。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日本希望臨時執政府提攜國民軍，以防奉系勢力繼續壯大，伸向關內，影響日本在東三省的勢力。³⁸ 加上，日蘇協定簽署後，日本在東三省利益已不需依賴奉張。因此，雖然奉系獲勝，但戰後的東北亞形勢卻愈形對其不利。日本駐奉領事內山清認為，奉軍勝利只會讓日本更難以控制奉張。³⁹ 英駐日大使義律爵士（Sir

³² 「溫施利赫特和博爾特諾夫斯基給斯大林的書面報告」（1925 年 9 月 30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697。

³³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 7 號記錄」（1925 年 8 月 21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664-665。

³⁴ “The Minister in China (Schur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1/3/1925, FRUS, 1925, Vol. 1, pp. 600-601.

³⁵ 「兒玉長官電」（1925 年 5 月 22 日），〈各國／支那之部〉，第 35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058000，微捲號：138。

³⁶ 「船津總領事」（1925 年 5 月 16 日），〈各國／支那之部〉，第 35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057900，微捲號：84。

³⁷ 「天津軍司令官」（1925 年 7 月 13 日），〈各國／支那之部／地方〉，第 42 / 3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148800，微捲號：105。

³⁸ James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41.

³⁹ 「支那時局ノ將來ト東三省ノ立場ニ關スル件」（1925 年 1 月 19 日），〈各國／支那之

Charles Eliot) 亦指日本「並不樂見張作霖大獲全勝，並成為北京的主人，因為他將會失去控制。」⁴⁰ 奉張無視日本抗議，興建奉天—海龍鐵路，更令日本軍政領袖對張不滿。此時，奉張卻希望以反共態度贏得國際（特別是英、日）支持，避免被蘇聯圍堵。五卅運動如火如荼時，他甚至詢問意大利駐華公使，如蘇聯對奉開戰，列強會否援助。⁴¹ 雖然英國駐奉總領事偉晉頌對張頗表同情，但倫敦並無援張想法。10 月，張作霖及奉系交涉處長于沖漢，又分別向新任駐奉總領事吉田茂及關東軍方面，談及蘇聯援助馮軍與張氏「反赤」的決心，表示希望與日人「共同防衛」。吉田只重申日本希望奉張在鐵路問題上合作，又暗示日本反對奉系擴張。⁴² 吉田向外相幣原喜重郎報告時，指張氏表面高唱「日支親善」，實則對日人「壓迫妨害」。⁴³ 奉張以蘇聯威脅要求英、日援助的計畫，成效有限。如郭松齡事件確實是日、蘇兩國的代理戰爭，則何以日本在 1925 年面對蘇聯大規模援馮時未有出手支援奉張？可見日本已將注意力由如何利用奉張保護其利益，轉移至如何箝制奉張。

為制衡國民軍，奉系繼續向關內擴張。胡景翼入陝後，奉張即向執政府要求委任駐紮徐州的張宗昌為山東督辦（於 5 月上任）。當國民軍於春、夏之際陸續占領陝西、甘肅、察哈爾等地時，奉張再向段祺瑞施壓，要求他委任楊宇霆為江蘇、姜登選為安徽軍務督辦，兩人於 9 月赴任。

奉張的關內擴張戰略及對五卅運動的處理手法使他成為輿論的攻擊對象。1925 年 5 月，日本廠方殺害中國工人，上海、青島兩地發生工潮；至 5 月 30 日，上海租界英籍巡捕向示威者開槍，造成 13 人死亡、40 多人受傷，是為「五卅慘

部》，第 34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056600，微捲號：72。

⁴⁰ “Sir C. Elliot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16/1/1925, FOCP, Vol. 29, p. 6.

⁴¹ “Mr. Palairet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5/7/1925, FOCP, Vol. 29, p. 307; “Mr. Palairet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18/7/1925, CPR, Vol. 5, p. 243.

⁴² 「關東軍參謀長」（1925 年 10 月 1 日），〈反奉天派紛擾事件（下稱「反奉」）／戰政況〉，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1100，微捲號：78；「吉田總領事電」（1925 年 10 月 30 日），〈反奉／戰政況〉，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1700，微捲號：398。

⁴³ 「吉田總領事電」（1925 年 11 月 5 日），〈反奉／戰政況〉，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2200，微捲號：124。

案」。當時全國反英反日情緒高漲，馮玉祥高調聲援罷工、罷學，主張對英宣戰。⁴⁴張作霖則認為運動是馮、蘇陰謀，旨在推翻執政府，因此派兵前往上海彈壓，以藉此獲得國際同情。⁴⁵可是，偉晉頌報告倫敦，國人並不同情奉張。⁴⁶

除派兵上海外，張氏亦於5月底前往天津，要求馮撤去駐京部隊。張抵津前，馮與國民軍領袖協議，對張氏進京採不抵抗主義，以博輿論同情，並藉此離間段、張兩人，誘使奉張自任總統，成為曹錕第二，並於京師變亂時趁機占領山西及西北地區。⁴⁷1925年5月，馮在南苑會見鄭士琦（山東督辦，受奉系壓力轉往安徽接任督辦一職，後引退）、岳維峻（河南督辦，胡景翼死後繼任）、孫岳、柏文蔚等代表，決議消滅奉軍，並擴充國民軍兵力至30個師。⁴⁸正如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指出，馮氏表面上處於守勢，但他在北京的影響力已非張氏所能及。⁴⁹張氏在楊宇霆、鄭謙與王永江等勸說下，與執政府合作，派東三省代表參與制憲會議和財政、軍事善後委員會，其屬下省分（東三省、直隸、山東、安徽、江蘇）亦舉辦了省代表的選舉，選出代表參加原定10月舉行的國民會議。

四、郭松齡決定倒戈過程

由於張作霖抵津後未有行動，馮氏轉而聯絡直系殘部以倒張。控制湘、浙、閩等省的直系蕭耀南、孫傳芳等本已視奉系為主要威脅，在馮煽動下，更開始具

⁴⁴ “Mr. Palairet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5/7/1925, FOCP, Vol. 29, p. 307; 劉敬忠，《國民軍史綱》，頁132-134。可是，馮氏為免被指為蘇聯傀儡，一再聲言自己並非共黨，又指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劉敬忠，《國民軍史綱》，頁113-114、140。

⁴⁵ 當時，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要「採取措施，使現時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倘若不能成功，那就依靠馮玉祥軍隊和國民黨軍隊推翻現政府，成立有國民黨人參加的新政府。」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8號（特字第1號）記錄」（1925年6月25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637。

⁴⁶ “Consul-General Wilkinson to Sir R. Macleay,” 27/11/1925, FOCP, Vol. 30, p. 128.

⁴⁷ 「北京坂西中將電」（1925年5月30日），〈各國／支那之部〉，第35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058100，微捲號：183。

⁴⁸ 「芳澤公使電」（1925年5月11日），〈各國／支那之部〉，第35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057900，微捲號：138。

⁴⁹ 「支那政況二關スル參考資料送附ノ件」（1925年9月7日），〈各國／支那之部〉，第36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059900，微捲號：93-94。

體行動。此策略與蘇俄中央政治局在 8 月的決定吻合。當時，蕭、孫等認為國民會議與關稅會議一旦成功，已控制上海的奉系無論實力和影響力都將會大增，並會繼續南進。為此，馮玉祥陸續派出代表與孫傳芳和張宗昌部將方振武聯絡，以組成反奉同盟。8 月，當直系孫傳芳、蕭耀南、靳雲鶚與蘇、皖軍代表於在漢口商議建立防禦聯盟時，馮去電推舉吳佩孚出山反奉，又承諾當孫傳芳舉兵時，命國民軍攻擊直、魯兩省。⁵⁰ 至此，在蘇聯援助下，馮玉祥不但擴充了國民軍的勢力和版圖，而且還確立了策反奉系內部和聯絡直系、國民黨、蒙古的方針，並煽動孫傳芳起兵倒張。⁵¹

1925 年 10 月 10 日，浙督孫傳芳以舉行「太湖秋操」演習為名，率部入侵江蘇。孫舉兵不久，蟄伏湖北的吳佩孚自任「討賊聯軍司令」，冀圖重組直系。奉系得悉孫氏意圖後，即決定放棄蘇、皖，把張宗昌部集中於津浦、隴海兩路的交匯處徐州，以保直、魯兩省。其時，由於蘇聯在中蘇邊境加強活動，⁵² 奉系仍以對外宣稱中立的國民軍為首要目標，因此將奉軍主力（由張學良、郭松齡共同指揮的第三方面軍，共 6 萬人）配置於灤州—唐山—天津一線，未將之投入徐州。奉系為免樹敵過多，於 11 月 1 日向馮表示希望締結和平協定。當時徐州戰局未明，馮尚未決定進攻，遂接受提議。11 月 13 日協定成立後，奉張為表誠意，於當日決定後撤。然而，奉軍在 11 月 6 日於徐州失利，已令國民二、三軍決心入侵直、魯。⁵³ 17 日，國民二軍孫岳部接近保定，與李景林部衝突。孫岳逐走李部後，又

⁵⁰ 王毓超，《北洋人士話滄桑》（北京：中國文史，1993 年），頁 107、109-110；「時局二關スル張弧内話報告ノ件」（1925 年 10 月 23 日），〈反奉／戰政況〉，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2000，微捲號：9。

⁵¹ 馮玉祥鼓動孫傳芳起兵一事，蘇聯似乎並不知情。1925 年 10 月初，伏龍芝去世前約兩星期曾向中國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指蘇方並不清楚孫傳芳與馮玉祥是否有共同計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 13 號記錄附錄」（1925 年 10 月 19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719。

⁵² 10 月底，奉軍收到來自伯力中國領事館的情報，指 5,000 蘇軍正進行大規模演習。「齊齊哈爾公所長電」（1925 年 10 月 24 日），〈反奉／戰政況〉，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2000，微捲號：12。

⁵³ 「支那使館附武官電」（1925 年 11 月 10 日），〈反奉／戰政況〉，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2300，微捲號：211；「板垣中佐電」（1925 年 11 月 12 日），〈反奉／戰政況〉，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2400，微捲號：244；「天津軍司令官電」（1925 年 11 月 16 日），〈反奉／戰政況〉，第 2 卷，《外務

違反國奉協定，更換保定、大名等地知事。18日，瀋陽接獲張宗昌急電，指國民二軍突襲山東定陶。兩軍交火後，奉張急召眾將回奉，定於21日商量對策。⁵⁴不過，郭松齡並未參與會議，反稱病人住天津租界的意國醫院，與其弟郭大鳴、部將高紀毅、霽雲、范浦江等人密謀起事。

郭簽署和馮玉祥的協定（馮於20日簽訂協議）後，即聯絡黎元洪及身處京津地區的國民黨人，並急召第三方面軍所有團長以上軍官於22日在灤州舉行會議。⁵⁵有關灤州會議，大致情況為：郭以衛兵包圍會場，先向眾軍官說明舉事決定，然後拘禁高維岳、趙恩臻、齊恩銘、裴春生4名師長以下31人，並宣布改編奉軍為「東北國民軍」，其後槍殺途經灤州的姜登選。⁵⁶至此，郭松齡正式開始反奉行動。⁵⁷

叁、郭松齡事件期間的國際活動

一、蘇、日兩國在郭松齡倒戈之角色

有關郭氏發動政變之近因，大陸論者多採用郭氏在10月赴日參加陸軍大演習期間發現張作霖「準備向日本借款購械攻擊馮玉祥」，並與國民軍將領韓復榘會面後決定反奉一說。⁵⁸不過，此說出自《馮玉祥日記》，而馮氏既為反張戰爭之始

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782500，微捲號：329；「天津軍司令官電」（1925年11月16日），〈反奉／戰政況〉，第2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782500，微捲號：330；「關東軍參謀長」（1925年11月19日），〈反奉／戰政況〉，第2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782500，微捲號：356。

⁵⁴ 《國聞周報》，第2卷第46期，收入章伯鋒編，《北洋軍閥》，第5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頁265。

⁵⁵ 「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年3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1210，《陸軍省大日記》，JACAR藏，檔號：C03022778300。

⁵⁶ 宋九齡口述，于俊滿整理，〈郭松齡反奉片段〉，收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85。

⁵⁷ 有關郭松齡事件詳細經過，見前述關東軍「張郭兩軍作戰經過」及「張郭戰二於ケル支那軍隊ニ關スル諸觀察並本戰亂ニ關スル聯諸問題」兩報告。

⁵⁸ 張安慶，〈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初探〉，《武漢大學學報》，第4期，頁65；毛覆平、王

作俑者，更自 1925 年初即密謀推倒奉系，因此其說法必須加以驗證。綜合各方資料，事件與蘇、日均有關係。根據關東軍的「張郭兩軍作戰經過」，郭氏抵日後，除見韓外，復與段祺瑞心腹吳光新會晤，吳向郭表示擔心執政府成為奉張傀儡。⁵⁹另外，據草柳大藏《滿鐵調查部內幕》，郭氏曾與滿鐵職員駒井德三談判，向其承諾與日本解決「懸案」。郭又請駒井安排他與參謀本部課長小磯國昭會面。駒井更代表郭氏與陸相宇垣一成提及推翻奉張。郭氏發現他們對張氏向關內擴張的做法不以為然，並明言日本將保持中立，遂認為他們會歡迎更換東北領袖。正因如此，郭起事後一直標榜「和平主義」，即不干涉關內事務的主張，以求日本讓其放手一搏。⁶⁰

張作霖與孫傳芳開戰後，莫斯科與北京的蘇聯代表均認為奉軍與國民軍不免衝突。蘇俄認為，華北戰亂是國民軍和國民黨的機會。10 月，加拉罕在莫斯科報告，指關稅會議是列強希望緩和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手段，因此必須破壞之：「如中國爆發國民戰爭，則蘇聯可輕易達成目標。」⁶¹ 10 月 13 日，中國委員會決定立即為國民軍運送武器。⁶² 伏龍芝指示國民軍現時「不（應）急於參與衝突」，而是要「敦促直系採取行動，迫使張作霖把大量兵力投向南方」，「加強在張後方及其交通線上的活動」，並建議蘇聯「加強（向國民軍）提供援助，特別把注意力

關興，〈郭松齡事變的性質及其失敗的原因〉，《學術月刊》，第 5 期，頁 70。原文見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434-435。日本陸軍大演習於 10 月 19 至 22 日間舉行。

⁵⁹ 「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204，《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⁶⁰ 草柳大藏，《滿鐵調查部內幕》（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36；亦見顧明義，〈郭松齡事件與日本〉，《日本研究》，第 4 期（1986 年），頁 48；Gavan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p. 169。「張郭兩軍作戰經過」只記載郭氏曾與「日本軍政要人」會面。見「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204，《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⁶¹ 「支那二關スル極東派遣員ノ報告及馮玉祥派遣員ト露國政府トノ交渉」（1925 年 10 月 29 日），〈支那、蘇連邦外交關係雜纂〉，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2030817700，微捲號：176、178-179；“Sir R. Macleay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28/10/1925, FOCP, Vol. 30, p. 65.

⁶² 10 月底，奉軍密探發現有 80 輛卡車將武器由庫倫運到張家口。「齊齊哈爾公所長電」（1925 年 10 月 24 日），〈反奉／戰政況〉，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2000，微捲號：12。

主要放在提供機槍、火炮和航空支援上」。報告中特別提到「加強張軍瓦解工作」，並要「想辦法和張宗昌、李景林和其他將領建立聯繫，使他們離開張」。⁶³ 可見，蘇聯此時仍視分化為擊敗奉張之法。

10 月 14 日，馮玉祥在蘇聯的代表熊斌與加拉罕於莫斯科會面，後者表明蘇方不會加入戰爭，以免「日、美（可能指英國，原文如此）」等國捲入戰事，但蘇俄在國奉戰爭期間將會「盡一切手段予張作霖困難」，並向馮再提供 200 萬大洋的借款。蘇方又向馮派出財政、經濟和政治顧問，顯然希望加強對北京新政府的控制。⁶⁴ 11 月初，共產國際在華代表維丁斯基、蘇聯駐華北軍事顧問團團長沃羅寧、國民黨北方委員徐謙、國民軍參謀劉驥等人在張家口開會，擬定奪取熱河和天津的計畫。⁶⁵ 與蘇聯接洽後，馮派韓復榘於 11 月 6 日再赴津面郭，傳達馮希望合作的意願。期間，李大釗亦派遣任國楨協助郭、馮聯絡。⁶⁶ 兩日後，馮部高級將領開會，決定占領京、津。⁶⁷ 雖然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Ronald Macleay）當時尚未掌握確切證據，但他向倫敦報告指「難以相信蘇聯並非郭、馮兩人的同謀」。⁶⁸

據郭軍第四軍軍法處處長高問樵回憶，郭曾向該軍軍長霽雲透露，11 月 17 日國民二軍與李景林部衝突後，郭妻韓淑秀突然「從佈置於張作霖五夫人身邊的密探中得悉張打算將郭撤換，回奉受審」。⁶⁹ 郭曾與張學良討論，提議擁張上台，

⁶³ 「伏龍芝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中國軍事政治形勢的報告」（1925 年 10 月 13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 13 號記錄附錄」（1925 年 10 月 19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712、720。

⁶⁴ 「支那ニ關スル極東派遣員ノ報告及馮玉祥派遣員ト露國政府トノ交渉」（1925 年 10 月 29 日），〈支那、蘇連邦外交關係雜纂〉，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2030817700，微捲號：176-17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 84 號記錄」（1925 年 10 月 22 日），收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頁 725。

⁶⁵ 劉敬忠，《國民軍史綱》，頁 125。

⁶⁶ 丘權政，〈郭松齡聯合馮玉祥倒戈反奉及其失敗〉，頁 119。

⁶⁷ 王斌，〈試論國奉戰爭中的天津之戰〉，《軍事歷史研究》，第 1 期（2008 年），頁 88；韓玉辰，〈關於李景林與國民軍〉，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51 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頁 80。

⁶⁸ “Weekly Summary of Events in China,” 27/11/1925, CPR, p. 189.

⁶⁹ 韓淑秀（1891-1925），生於奉天瀋陽，曾就學於奉天女子師範學堂、協和女子大學、燕京大學。1910 年起信奉基督教。在京求學期間與馮玉祥夫人李德全成為莫逆，亦與張作霖五夫人友好。

但後者未有正視，只勸郭回奉陳述意見，並隨即按張作霖指示回奉，參加將於 21 日舉行的會議。⁷⁰ 郭即與部將在醫院內商議舉事。鑒於韓淑秀和馮玉祥夫人李德全的關係，似可推論「張作霖的秘密決定」是國民軍（甚至蘇聯）方面迫使郭松齡表態的假消息。⁷¹ 奉張早已得知郭、韓二人曾經會面，可是他並未將郭撤換，只於編成第三方面軍時，委任屬於士官派的于珍為副軍團長、韓麟春為第九軍長、郭則為第十軍長，改變張學良、郭松齡兩人事權不清的狀況，並以于、韓制衡郭松齡。因此，郭雖握有第三方面軍的部分實權，但只是第十軍司令，部隊仍只服從張學良的命令。如奉張不滿郭松齡反對開戰並打算把他押回受審，則何以把張學良召回，留下郭成為前線最高級軍官（時于珍、韓麟春尚未赴任）？再者，如奉張已懷疑郭氏有變而打算將其撤換，則何以整個奉系都對其倒戈全無準備而手忙腳亂？參與 21 日會議的第五方面軍司令張作相曾於出發前向參謀表示會議與停戰有關，可見當時和戰尚未有定論。⁷² 在 21 日的會議中，奉軍決定停止撤退，於天津周圍挖壕固守，但未有提及發動攻擊。⁷³ 而觀乎郭決定舉事後才於 19 日派其弟郭大鳴赴張家口見馮，與其簽訂協議，又倉卒與黎元洪和國民黨建立聯繫，可見郭氏 17 日前尚在猶豫，但所謂「張作霖的秘密決定」，終使郭自以為反意已洩，遂決心反奉。雖然郭大鳴指出郭氏本人並未與蘇接洽，亦未直接得到蘇援，⁷⁴ 可是郭松齡事件似可算是蘇聯在 1925 年在華活動之間接結果。

二、開戰初期日本在關外的活動

郭松齡雖於 10 月時曾前往日本，但起事後才具體著手對日關係。12 月 2 日，郭軍出關後，郭向日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發出電報，承諾「極力尊重」外國人生命財產及條約權利。電文中，郭聲言日奉相鄰，關係密切，為免日本官民誤會，

⁷⁰ 高問樵，〈關於郭松齡反奉倒張的經過紀實〉，收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 44；魯穆庭，〈憶瀋州會議及其他〉；韓世儒，〈郭松齡反奉的軍事部署及戰鬥經過〉，收入《遼寧文史資料選輯》，第 16 輯（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52、60。

⁷¹ 姚東藩，〈郭松齡反對奉張東軍見聞紀略〉，收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 6。

⁷² 王之佑，〈張作霖擊敗郭松齡經過〉，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35 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2 年），頁 131。

⁷³ 《國聞周報》，第 2 卷第 46 期，收入章伯鋒編，《北洋軍閥》，第 5 卷，頁 265。

⁷⁴ 郭大鳴，〈先兄郭松齡將軍傳〉，《傳記文學》，第 16 卷第 2 期（1970 年 2 月），頁 5-14。

因此特別聲明尊重日本條約權利及日政府或私人與中國當局的契約和與中國人合辦的實業，而且省政府雇用的日本顧問將會全數留任。⁷⁵ 12月2日上午，郭大鳴抵津，與日本天津軍（即支那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見面。郭大鳴稱郭軍舉事純為和平，並保證日本利權和居民的安全。他指郭軍有「赤化傾向」一說純為敵方宣傳，其兄已起草聲明「反赤」。他又稱郭軍準備在錦州和新民之間和張軍會戰，成功後奉張將會下野，暗示戰鬥對日本在滿利益影響不大。⁷⁶ 同時，郭氏又派殷汝耕赴旅大於12月5日向日方聲言郭軍「絕無赤化」，亦尊重日本利權。⁷⁷ 殷又與日駐華公使芳澤見面，稱郭軍將於一、兩周間進入瀋陽，承諾「尊重附屬地」。⁷⁸ 可是，由於張軍自戰事初起即決定在瀋陽附近作最後抵抗，使郭氏在錦州和新民之間擊敗奉軍並迫使奉張下野的計畫化為泡影。

戰爭爆發之初，日本在滿機構，特別是關東軍和滿鐵即密切注意事態發展，以趁機加強戰後影響力。11月24日清晨，張作霖派張學良乘車到灤州，嘗試召回部隊，但後者中途折回。⁷⁹ 被父嚴斥後，張學良再度出發，先到連山與張作相等商量陣地部署，再乘軍艦鎮海至秦皇島，希望先了解郭氏態度再前往灤州。張派儀峨誠也、荒木五郎兩名日本顧問上岸，與關東軍派往灤州觀察郭氏態度及郭軍內部形勢的參謀浦澄江見面，三人再與郭松齡派遣的日人醫生守田福松會晤。浦、儀峨和荒木三人於26日中午在昌黎與郭面談，傳達張學良面郭的要求，遭郭

⁷⁵ 「第一九五號」（1925年12月3日），〈反奉／戰政況〉，第3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783100，微捲號：56。根據鄭殿起回憶，郭氏聲明同意奉海、齊路與日本合作興建；所有中、日所訂條約以自郭軍反奉之日止，一律承認；郭軍擊敗奉軍後，將於馬三家子停止，待秩序安定後再入城；與日本開誠相見；防止赤化。郭亦表明不會承認張作霖和日本政府在戰時達成的所有協定。見鄭殿起，〈郭松齡反奉經過〉，收入《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第2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288-289。

⁷⁶ 「第二七九號」（1925年12月2日），〈反奉〉，第1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778400，微捲號：180。

⁷⁷ 「第一一一四號」（1925年12月4日），〈反奉／戰政況〉，第3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783200，微捲號：65-67。

⁷⁸ 「第一一一二號」（1925年12月4日），〈反奉／戰政況〉，第3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783200，微捲號：69-70。

⁷⁹ 據戰翼翹口述，張氏因懼怕被郭挾走而回奉。李毓澍訪問，陳孝恭記錄，郭廷以校閱，《戰翼翹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頁47。

拒絕。27 日，浦澄江與郭見面，期間郭氏向其表示他秉持「和平主義」，反對張作霖的「武力統一」政策，並希望日本給予「消極援助」，保持中立。浦澄江則含糊地向郭表明關東軍對兩軍行動將有所應對。28 日，張學良委託守田攜親筆信見郭，勸其和解，郭氏則以張作霖下野和張學良赴日為條件。張得到答覆後，即乘艦前往大連。⁸⁰ 據曾任職於郭軍外交處的齊世英回憶，浦澄江曾向其表示如關東軍方面認為郭無勝算，根本不會派員接洽。⁸¹ 由此可見當時關東軍的騎牆態度。浦澄江向上峰報告郭軍官兵對倒戈不安、郭馮之間有確實聯絡、郭氏會採納國民黨政綱等情，但未有指郭軍赤化。⁸²

由於郭松齡對外公布的造反理由為「清君側」，即清除包括總參議楊宇霆在內的「士官派」，楊為避其鋒，遂於 24 日深夜去職往大連。楊去職前，曾與日領事內山清會面。楊向內山表示郭氏以「清君側」為名倒戈，因此楊決定去職，令郭失去口實。⁸³ 張學良抵大連後，即與楊一道往訪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和關東廳長官兒玉秀雄，向兩人表明討郭的決心後回奉。1926 年中，關東軍方面曾向張作霖表示，郭松齡事件發生時，楊宇霆曾以張個人名義和關東軍簽訂允許日人建築 5 條鐵路的協議，報答日方採取對奉張有利的行動。⁸⁴ 現時，至少有兩個證據指奉張不知楊氏前往大連之目的。據姚東藩指，事件初期，楊曾失蹤「三、四日」，張遍尋不獲，大發雷霆。11 月 25 日晚，奉張曾向總領事吉田茂抱怨楊棄他而去。⁸⁵

⁸⁰ 林正和著，張錦堂、任松譯，〈守田福松「三諫」郭松齡〉，收入《瀋陽文史資料》，第 9 輯（瀋陽：瀋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 年），頁 156-157；鄭殿起，〈郭松齡反奉經過〉，《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第 2 卷，頁 281；「特報（支那）第一三〇號—郭松齡卜蒲參謀會談ノ要旨」（1925 年 12 月 20 日），〈密大日記—大正 15 年〉，第 6 冊，《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5100，微捲號：236。

⁸¹ 齊世英著，林忠勝記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頁 43。

⁸² 「特報（支那）第一三〇號—郭松齡卜蒲參謀會談ノ要旨」（1925 年 12 月 20 日），〈密大日記—大正 15 年〉，第 6 冊，《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5100，微捲號：242-243。

⁸³ 「第一九五號」（1925 年 11 月 25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100，微捲號：62。

⁸⁴ 姚東藩，〈郭松齡反對奉張東軍見聞紀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 12。

⁸⁵ 「第一九九號」（1925 年 11 月 26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200，微捲號：70。

不過，楊宇霆與日簽訂協議後，日本方面並無任何動作，陸軍更於 12 月 4 日的閣議中反對援張，可見日本在東三省機構此時並不急於援張。

三、日本的「多頭外交」及關東軍兩次警告

郭松齡事件發生後，日本外務省、陸軍省、關東軍、滿鐵、關東廳、郭松齡、張作霖、奉系文治派等均四出活動，形成多頭外交的亂局。郭軍起事初期，日本駐奉天（瀋陽）總領事吉田茂曾向外相幣原喜重郎建議援張，但其後態度驟變，認為只要日本保持中立，則無論誰勝誰負都將依賴日本。⁸⁶ 倡議援張最力者為滿鐵理事松岡洋右，但滿鐵亦決定當郭松齡的權力確定後，即容許郭軍攜同武裝使用滿鐵。⁸⁷ 12 月 4 日，日本召開內閣會議，以整合各機關對事件的應變。陸相宇垣一成認為，雖然奉張的繼承者可能更難控制，但日本援助張則「甚為危險」，故此只應保護在滿日人的生命財產。幣原則認為，馮玉祥及國民黨「將左右中央政局」，因此政府應「與該派聯絡，指導其追尋正確之途徑，防止脫離軌道（即赤化）。」幣原認為向郭松齡表達日本中立的決心，足以向其示好，使之成為日本的伙伴。⁸⁸ 鑑於日、蘇之間在 1925 年的協定，日本已無必要依賴奉張維持在滿利益，因此幣原以中國全局為重，轉向可能即將控制全國的國民黨，認為郭勝張敗已成定局。

12 月 5 日，吉軍張作相部（時張學良部正在重組，未及參與戰鬥，亦無損失）在連山戰敗，吉田茂即準備調停兩軍，以維持日本影響力。同日下午，奉天省長兼「文治派」首腦王永江向吉田要求日本協助維持瀋陽秩序。⁸⁹ 當晚，王再請吉田代為調停，後者向東京建議由日本出面，以張作霖下臺為條件，並於必要時派

⁸⁶ 「吉田總領事電」（1925 年 11 月 27 日），〈反奉／戰政況〉，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2800，微捲號：462；「吉田總領事電」（1925 年 11 月 27 日），〈反奉／戰政況〉，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2800，微捲號：464。這兩份電報均於同日收到。

⁸⁷ 喻君，〈從滿鐵檔案看郭奉戰爭中的日本當局〉，《蘭台世界》，第 2 期（2006 年），頁 67。

⁸⁸ 「日本內閣會議關於中國時局談話之概要」，收入《北洋軍閥》，第 5 卷，頁 291。

⁸⁹ 阮振鐸，〈郭松齡反奉期間張作霖與日本的勾結〉，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35 輯，頁 164-165；「第二二五號」（1925 年 12 月 5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400，微捲號：217。

兵向雙方施壓，確保政權和平移交。幣原認為「大勢將定」，拒絕派兵建議，但於 7 日指示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向兩軍發出警告，要求兩軍不得進入南滿附屬地，亦不得傷及日本在滿利益及僑民。他又接受吉田建議，派內山清向兩軍發出和平勸告。⁹⁰ 不過，由於奉張於 6 日晚已決定繼續抵抗，吉田只好於 7 日委託守田福松以私人身分面郭，知會他日本政府的態度並「探詢郭松齡對於收拾戰局的看法」。守田於 12 月 8 日出發，11 日抵錦州和郭會面。守田發現郭氏「有穩操勝券的把握」，堅持要張退位，遂放棄斡旋回奉。⁹¹ 按吉田和王永江的要求，關東軍在 5 日至 9 日間向附屬地外派出 92 名警察和憲兵，成立 7 個臨時派出所，守衛皇姑屯站、日本在留民協會、朝鮮銀行，以至瀋陽城內的滿鐵公所等地。⁹²

在東京尚未清楚情況時，關東軍與眾日本顧問卻自行採取一系列行動，促成奉張向日方作出更多承諾。姚東藩指出，連山戰敗當晚瀋陽曾發生停電，並有顧問經公署參謀長王樹常向張報告警察所被襲，詢問是否需要日軍援助。事件令張精神更為緊張。⁹³ 12 月 6 日，日顧問（應為町野武馬或松井七夫）向奉張指郭已派殷汝耕與日接洽，要求使用滿鐵運兵。奉張獲悉郭松齡與日本有所聯絡後，即通過町野，安排與當時往瀋陽視察的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恒少將見面，以個人名義允許日人在內蒙東部及東三省有商租權、間島有行政權、延長吉林敦化鐵路，及於洮昌道各縣設領事館等項為條件，要求戰敗時可到旅順、代為保管運到日界的財產，⁹⁴ 並借款 300 萬日元為流亡用（未使用即歸還）。關東軍反向張保證不讓

⁹⁰ 林正和著，張錦堂、任松譯，〈守田福松「三諫」郭松齡〉，收入《瀋陽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158-159；「第二二六號」（1925 年 12 月 5 日）、「第二二九號」（1925 年 12 月 5 日）、「張郭兩軍二對シ和平解決斡旋方申入レ訓令ノ」（1925 年 12 月 7 日），收入《日本外交文書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大正 14 年（1925 年）第 2 冊下卷，頁 848-850、851、855；「關東廳電」（1925 年 12 月 6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400，微捲號：208。

⁹¹ 林正和著，張錦堂、任松譯，〈守田福松「三諫」郭松齡〉，收入《瀋陽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160-161。

⁹² 「十二月九日奉天ニ於ケル憲兵ノ警戒配備狀況別紙要圖ノ二通付及報告」（1925 年 12 月 18 日），〈密大日記—大正 15 年〉，第 6 冊，《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5100，微捲號：69-70。當時瀋陽約有 1,000 名中國警察。

⁹³ 姚東藩，〈郭松齡反對奉張東軍見聞紀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 15。

⁹⁴ 無獨有偶，英國駐奉總領事亦發現郭松齡將其財產置於日租界內。“Consul-General Wilkinson to Sir R. Macleay,” FOCP, Vol. 30, p. 128.

郭軍在南滿鐵路附近作戰。當晚，齋藤恒向關東軍報告，指瀋陽市面出現大混亂，以此向政府施壓，迫使日本政府決定派兵。⁹⁵ 翌日，日政府即決定向兩軍發出警告，禁止兩軍在滿鐵及附屬地範圍內作戰。

12月8日，白川義則發出第一次警告，不准兩軍進入滿鐵沿線及附屬地。張作霖除了在回覆中承諾注意和尊重日人生命財產和利益外，還特地指出身為長官有剿辦亂兵的「權利」與「責任」，並指郭軍起事為赤化活動。10日，浦中佐乘日艦到錦州，將警告文交予郭松齡。郭表示將貫徹中日親善，但一再要求關東軍明確指出日軍警備範圍及合法性來源。⁹⁶ 浦中佐未有答覆問題，更於11日晨第二次見面時在郭一再追問下宣稱日方對郭軍所有行動「均有應對方案。」⁹⁷ 最後，郭松齡在回覆中承諾不會在南滿鐵路沿線戰鬥。⁹⁸ 當時，白川自行決定不准兩軍進入南滿鐵路附屬地兩旁30公里，並於12日請示東京。另一方面，郭松齡恐與日破裂，即派蔡多祥赴日接洽。15日，殷汝耕再向芳澤公使重申郭軍並無赤化，蔡則在東京與幣原的秘書會面，承諾「剷除武斷派（即承諾不再干涉關內政治）」、「去除赤化之因素」、「爭取日本援助，振興產業」，「並進一步實行與日本的經濟合作」。⁹⁹ 芳澤私下向殷汝耕、郭大鳴等表示如「奉軍敗退，通過南滿鐵路，跟蹤追擊，應無問題」，顯示如郭軍勝利，日本仍會倒向郭氏。¹⁰⁰ 日本從中運動，令張、郭雙方都對日本作出退讓。

⁹⁵ 阮振鐸，〈郭松齡反奉期間張作霖與日本的勾結〉，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頁163；羅靖寰，〈日奉密約〉，收入《北洋軍閥》，第5卷，頁502、504；「大正十四年支那時局詳報，自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密大日記—大正15年〉，第6冊，《陸軍省大日記》，JACAR藏，檔號：C03022775100，微捲號：326。

⁹⁶ 「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年3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1304-1311，《陸軍省大日記》，JACAR藏，檔號：C03022778300；「第五三五號」（1925年12月13日），〈反奉〉，第2卷，《外務省記錄》，JACAR藏，檔號：B03050779200，微捲號：20；「郭松齡對關東軍司令官第一次通牒之答覆」，收入《遼寧文史資料選輯》，第16輯，頁181。

⁹⁷ 當郭松齡聲稱將會採取自由行動時，浦即出此言。郭即以朋友身分要求詢問日本有否派兵援張，浦否認之，會面在氣氛僵持下中斷。「特報（支那）第一三〇號—郭松齡卜蒲參謀會談ノ要旨」（1925年12月20日），〈密大日記—大正15年〉，第6冊，《陸軍省大日記》，JACAR藏，檔號：C03022775100，微捲號：257-263。

⁹⁸ 「郭松齡致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函」（1925年12月11日），收入《北洋軍閥》，第5卷，頁294-295。

⁹⁹ 「郭松齡特使蔡多祥與岸秘書官會談紀要」，收入《北洋軍閥》，第5卷，頁295-296。

¹⁰⁰ 司馬桑敦等，《張老帥與張少帥》，頁259。

當郭軍代表尚與日方交涉時，身處前線的日本駐軍則由於日本政府尚未表態而根據白川的指示決定機宜，造成更大混亂。12 月 12 日，郭軍第十二旅抵達溝幫子，翌日進入營口對岸的河北站。其時營口守軍已聞風而遁。白川得知消息後，急電獨立守備第三大隊（大隊長安河內勇中佐）率部阻郭軍入城。14 日，安河內抵河北站，與郭軍外交主任齊世英、第十二旅參謀長蘇炳文，以及經過該地的守田醫生會晤。安河內按白川指示，不准兩軍進入鐵路附屬地兩旁 30 公里內（13 日，日本內閣會議後決定禁區範圍為 12 公里，但安河內尚未收到新指示，仍以關東軍司令部擬定的 30 公里為限）。郭軍同意不進入營口，並轉往田莊台等地徵集物資。同日，張作霖命營口駐軍回城，亦為關東軍所拒。¹⁰¹ 15 日上午，關東軍按政府指示再向兩軍警告，要求兩軍不得在南滿鐵路附屬地兩側 20 華里（12 公里）內有任何戰鬥動作，具體包括「追擊」及「退卻」，違者解除武裝，但允許禁區內「歷內駐留的中國軍隊按原狀繼續駐留」，包括瀋陽城外的奉軍和距離營口只有 4 公里的郭軍第十二旅。¹⁰² 禁令雖偏袒奉軍，但亦令奉張無路可退。

郭松齡事件發生時，關東軍曾多次增兵東省（第一次 11 月 28 日、第二次 12 月 6 日、第三次 12 月 8 日、第四次 12 月 17-19 日），防守瀋陽城西面的滿鐵附屬地及滿鐵沿線。¹⁰³ 直至 12 月 9 日，日軍在附屬地和滿鐵沿線的兵力共 4,000 人。¹⁰⁴ 關東軍發出第二次警告後再次向奉省增兵。12 月 17-19 日，共有步兵 2 營，炮兵

¹⁰¹ 「滿州ニ於ケル奉郭戰當時ノ内情」（1926 年），〈反奉／戰政況〉，第 3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83100，微捲號：17；「張郭兩軍作戰經過」，〈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312-1315，《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齊世英著，林忠勝記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頁 47-49。

¹⁰² 「張郭兩軍作戰經過」，〈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316-1317，《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關東軍司令部發有關『關參第 38 號命令』之指示」（1925 年 12 月 15 日），收入《北洋軍閥》，第 5 卷，頁 297。

¹⁰³ 「大正十四年支那時局詳報，自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密大日記—大正 15 年〉，第 6 冊，《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5100，微捲號：312、323、325、342。

¹⁰⁴ 在東省日軍各部包括：第十師團司令部（37 人）、第八旅團司令部（16 人）、第三十三旅團司令部（12 人）、步兵第十聯隊（317 人）、步兵第三十九聯隊（397 人）、步兵第四十聯隊（349 人）、步兵第六十三聯隊（404 人）、騎兵第十聯隊（50 人）、炮兵第十聯隊（245 人、炮 12 門）、工兵中隊（56 人）、重炮兵中隊（86 人、無炮），以上約 2,000 人集中在附屬地；另有 4 個各約 500 人的獨立守備大隊防守鐵路線。

2 連由朝鮮出發，另有一混成旅由日本本土出發，但兩部於戰鬥結束前均未抵達。¹⁰⁵

四、蘇聯、國民軍與郭松齡事件

前人研究均少有留意郭松齡事件與國民軍在 1925 年年底企圖占領京津以及內蒙軍進攻熱河的關係。從奉軍角度看，蘇聯支持下的國民軍在京津、山東等地的攻勢是郭松齡事件的一部分。於國民軍而言，占領京津地區，令該軍毋須再依賴張家口—庫倫公路自蘇聯輸入軍火，更可以獨占北京政府的關稅收入。¹⁰⁶ 對蘇聯而言，此戰則關乎中國盟友能否在北京成立另一個革命政權，與廣東呼應。至於日本，京津之戰則影響正在進行的關稅會議，但正如前述，幣原在閣議中表明，日本政府已準備與即將控制北京的新政權對話，將其納入日本的影響下。

雖然加拉罕及國民黨左派希望馮玉祥能推翻執政府，成立新政權，但馮卻另有打算。馮的日本顧問松室孝良報告，浙孫起兵後，馮身邊的國民黨人徐謙等不斷要求馮對奉開戰，推翻執政府。¹⁰⁷ 可是，馮未有理會，反而考慮自組政府，恢復黃郛內閣。¹⁰⁸ 郭軍倒戈後，國民軍才採取動作。11 月 25 日，馮軍攻天津，另派 8 旅占熱河（其中包括內蒙軍）。¹⁰⁹ 執政府中的親奉派如姚震、曾毓雋等四散離京，曾氏更被拘禁。據當時逃離北京的奉派人物莫德惠所言，國民軍早於郭軍有變前已潛入北京，事件發生後段祺瑞幾成人質。¹¹⁰ 段於 26、27 兩日的閣議中

¹⁰⁵ 「張郭兩軍作戰經過」，〈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375-1377，《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¹⁰⁶ 郭馮密約中，即有國民軍可以自由使用天津港口的條款。

¹⁰⁷ 「天津軍司令官」(1925 年 11 月 16 日)，〈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松本記錄〉，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49500，微捲號：350。

¹⁰⁸ 「第一〇〇七號」(1925 年 10 月 21 日)、「第一〇〇八號」(1925 年 10 月 21 日)，〈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松本記錄〉，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49500，微捲號：350。

¹⁰⁹ 「支第五四六號」(1925 年 12 月 9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600，微捲號：298；Christopher P. Atwood,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Leiden; Boston: Brill, 2002), pp. 504-514.

¹¹⁰ 「第一七八號」(1925 年 11 月 13 日)，〈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松本記錄〉，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50100，微捲號：95；古蔭孫，

聲言辭職，但為維持關稅會議，決定邀馮入京。其時，國民軍內部對如何利用此次機會出現分歧。與北京國民黨左派較為接近的國民二、三軍領袖均希望推翻執政府，成立由吳稚暉、李石曾、徐謙和黃郛四人領導的委員制政府。馮卻於 27 日表示不願推翻段氏，亦不願受制於委員制政府。¹¹¹ 28 日下午，徐謙等發起國民大會，以打倒賣國政府、反對關稅會議、實現國民政府為口號，意圖推翻執政府，但馮軍並未附和，變相阻止政變。¹¹² 為求自主，馮氏於 12 月 4 日與到訪張家口的日本坂西利八郎中將表示支持三民主義並「反對赤化」，要求日本支持，又一再向英使表明反共。¹¹³

在東北方面，蘇聯雖未公開支援郭軍，但企圖影響局勢的力度不比日本遜色。郭松齡舉兵後，任國楨與加拉罕和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聯絡，商議援郭事宜。¹¹⁴ 當奉張於 12 月 3 日令新編黑軍第二十二旅乘中東鐵路列車南下時，控制該路的蘇聯經理伊萬諾夫以必須收取黃金為車費為由拒絕運送該隊，致該隊步、騎兵近 3,500 人（連同其後援兵約 6,000 人）需由齊齊哈爾行軍至洮南，利用未完成的昂昂溪—洮南鐵路前往瀋陽。¹¹⁵ 吳俊陞於連山戰敗後曾暫緩派兵，至 9-11 日再命援軍前進。¹¹⁶ 該軍於 16-18 日抵奉，趕及參加遼河會戰，防守奉軍左翼。¹¹⁷ 除中東

《月丑內亂始末記實》（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59-162；《國聞周報》，第 2 卷第 47 期，收入《北洋軍閥》，第 5 卷，頁 279。

¹¹¹ 「支電四七八」（1925 年 11 月 28 日），〈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松本記錄〉，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50500，微捲號：241。

¹¹² 「第一〇七五號」（1925 年 11 月 28 日），〈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松本記錄〉，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50500，微捲號：245；“Weekly Summary of Events in China,” 5/12/1925, CPR, p. 190；劉敬忠，《國民軍史綱》，頁 152-155。

¹¹³ 「北京坂西中將電」（1925 年 12 月 6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500，微捲號：262；“Weekly Summary of Events in China,” 16/12/1925, CPR, p. 191；“Weekly Summary of Events in China,” 21/12/1925, CPR, p. 193。

¹¹⁴ 王宗華、劉曼容，《國民軍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96。

¹¹⁵ 「機密第六七番電」（1925 年 12 月 3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400，微捲號：182。

¹¹⁶ 「張郭戰二於ケル支那軍隊ニ關スル諸觀察並本戰亂ニ關スル聯諸問題」（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787，《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¹¹⁷ 「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291-1293，《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路拒運黑軍外，英國駐日武官自波蘭方面得到情報，指蘇聯曾提供 200,000 圓大洋予郭松齡。¹¹⁸ 日本情報亦指蘇聯以駐瀋陽和哈爾濱領事館為中心，散布對奉張不利的謠言和宣傳，又於戰前企圖收買中東路駐軍。蘇方亦於黑龍江—蘇聯—蒙古邊境調兵，更有俄人率領的「蒙古邊防軍」以討伐馬賊為藉口，進駐滿洲里、海拉爾 100 公里內。¹¹⁹ 據錢公來《東北史話》，郭軍舉事前，李大釗與民黨人士段右軍接洽，又與國民黨人朱霽青接觸，提出供應資金予朱組織軍隊，但朱以李氏非廣州國民黨中央為由拒絕合作，並自行赴東省組織民軍。¹²⁰

肆、郭松齡失敗原因分析

事件中，張作霖之所以能力挽狂瀾，論者一般強調日本的作用。可是，關東軍於戰後專門為戰役的各方面撰寫詳細報告，足證日本對張軍獲勝的軍事原因亦感興趣。為此，本節將探討日、蘇干涉的實際作用，並比較日、蘇干涉與軍事因素的重要性。

一、日、蘇兩國干涉之影響

日本不准郭軍進入南滿鐵路及營口的決定廣被視為郭軍失敗之主因。論者謂此舉令郭軍不得利用南滿鐵路，分兵從南面或西南兩面進攻瀋陽，迫使郭軍沿京奉鐵路從正面進攻奉軍遼河陣地，又不能獲得營口的物資，更令郭軍將士失去信

¹¹⁸ “Colonel Piggot to Sir C. Eliot,” in “Sir C. Eliot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18/1/1925, FOCP, Vol. 8, p. 7; 郭氏透過馮玉祥獲得天津遠東銀行款項，該款最終用在天津購買禦寒衣物，但因李景林反正，而未送至郭軍。鄭殿起，〈郭松齡反奉經過〉，《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第 2 卷，頁 281；魯穆庭，〈憶灤州會議及其他〉，頁 56-57。

¹¹⁹ 「關電四三九」（1925 年 11 月 20 日），〈各國／支那之部／地方〉，第 42 / 3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149300，微捲號：389；「張郭戰ニ於ケル支那軍隊ニ關スル諸觀察並本戰亂ニ關スル聯諸問題」（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786-1788、1789-1795，《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¹²⁰ 錢公來，《東北史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 年），頁 133-134。

心。¹²¹ 綜觀中、日資料，郭氏從未要求滿鐵協助運兵，¹²² 起事初期只打算利用京奉線突襲瀋陽，其後並無具體計畫。再者，正如上文提到，郭松齡抵錦州後，未等日人警告，即分出五分之一兵力前往山海關，另派一旅往營口。此舉已令郭軍可用兵力少於張軍，難以分兵進攻，而且郭氏於連山戰役後擔心士卒逃脫，一直依賴京奉鐵路運兵，根本難以分兵南滿鐵路，進擊擁有內線及數量優勢之敵。設若郭軍全軍由滿鐵線自西南進攻，則奉軍移向瀋陽南面建立陣地即可抵禦。如郭軍分兩路進攻，則兩路不但不能互相呼應，而且有被各個擊破之虞。英駐奉總領事亦於 12 月 15 日指出：「誠然，如郭軍離開鐵路線，可輕易繞過張軍陣地，但郭軍並無足夠的裝備與載具在寒冬中移動」。¹²³ 因此，日人禁止郭軍進入及使用南滿鐵路，對郭軍部署影響不大。另一方面，關東軍收到的命令是禁止中國軍隊在滿鐵沿線 12 公里內進行包括追擊和退卻等行動，並將進入禁區的中國軍隊繳械。張軍於禁區的邊緣外布防，如被擊潰，亦無路可退。至於日軍干預令郭軍前進緩慢一說，亦難以成立，蓋奉軍撤退時已盡毀連山至新民間的鐵路、橋樑及給水設施，令郭軍在隆冬中難以利用鐵路運兵，因此郭軍主力進展緩慢。¹²⁴

亦有論者認為日本增兵南滿令郭軍將領感到沮喪或心存觀望，但於前線親身參與郭軍起事者多未提及日軍援助張軍，反而經常提到士兵不願「吃張家飯，打張家人」，或云軍官被勝利沖昏頭腦，掉以輕心。¹²⁵ 再者，郭軍仍能於 12 月 19

¹²¹ 如司馬桑敦等，《張老帥與張少帥》，頁 32-33。

¹²² 殷汝耕於 12 月 5 日與白川司令官及滿鐵理事大藏公望見面前，曾聲言郭軍將迅速在錦州擊潰奉軍，於一兩週內入奉，並未提及使用滿鐵。加上郭松齡一直自信可輕取張軍，似無必要為使用滿鐵而對日讓步。

¹²³ “Consul-General Wilkinson to Sir R. Macleay,” 15/12/1925, FOCP, Vol. 30, p. 186.

¹²⁴ 詳見韓世儒，〈郭松齡反奉的軍事部署及戰鬥經過〉，收入《遼寧文史資料選輯》，第 16 輯；「奉天第二七八號」（1925 年 12 月 8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600，微捲號：289；「第二四一號」（1925 年 12 月 11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800，微捲號：322；「鎌田公所長電」（1925 年 12 月 15 日），〈反奉〉，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9200，微捲號：54。

¹²⁵ 高問樵著，魯穆庭批註，〈關於郭松齡反奉倒張的經過紀實〉，收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 50、65；郭景珊，〈關於國民革命軍司令郭松齡倒張作霖的經過〉，收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 95。

日挺進至新民，當時日軍軍官曾向英領事透露，郭軍仍有一半機會勝利。¹²⁶ 如郭軍能擊破張軍防線，亦足以迫使張作霖放棄抵抗，或令日人決定趕張下臺以利與獲勝的郭松齡討價還價。雖然一直有關於日本正規軍參戰的傳言，但如果屬實，關東軍似無必要詳細研究此役，而且英國駐奉總領事亦證明並無此事。¹²⁷ 械彈方面，正如曾於奉軍任職的魯穆庭指出，奉天兵工廠有大量庫存大炮，而且其彈藥產量亦足夠奉軍使用。¹²⁸ 至於日本顧問的角色，從張作相在連山、遼河戰役中兩次否決日人意見，以及楊宇霆向顧問解釋他防守遼河的決定等事件中可以看出，日人雖可能對奉軍作出若干指導，但對作戰計畫影響有限。¹²⁹

日本干涉最重要的影響，在於鼓勵張作相和吳俊陞兩人繼續作戰。¹³⁰ 關東軍的報告亦認為，吉、黑兩軍在連山戰敗後繼續抵抗是由於張作相和吳俊陞均相信張作霖得到日本援助。¹³¹ 日軍的態度雖未必是兩人決定援張的唯一原因，但的確有助穩住張、吳兩人。連山會戰後，張作相戰意全失，曾打算逕回吉林，但左右勸其先回奉面見張作霖。奉張可能於當時向張作相聲稱已獲日援，以此鼓舞其信心。兩人會面後，前者同意繼續抵抗，並於 8 日取消撤回吉林的命令。¹³² 張作相於 9 日短暫回吉，穩住省議會並與省長王樹翰及參謀長熙洽商去向問題，王樹翰認為可以再戰，而且就算戰敗，張可以暫退大連，將權力暫交予參謀長，等待缺

¹²⁶ “Consul-General Wilkinson to Sir R. Macleay,” 15/12/1925, FOCP, Vol. 30, p. 186.

¹²⁷ “Sir R. Macleay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13/3/1926, FOCP, Vol. 30, p. 341.

¹²⁸ 王銘閣，〈郭松齡時我的所見所聞及其結局〉，收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 139-140。

¹²⁹ 詳見王之佑，〈張作霖擊敗郭松齡經過〉，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35 輯，頁 149-150。有關楊宇霆向日顧問解釋選擇遼河為防禦據點的決定，詳見「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263-1264，《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¹³⁰ 「張郭戰ニ於ケル支那軍隊ニ關スル諸觀察並本戰亂ニ關スル聯諸問題」（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739-1740，《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¹³¹ 「張郭戰ニ於ケル支那軍隊ニ關スル諸觀察並本戰亂ニ關スル聯諸問題」（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739-1740，《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

¹³² 「奉天二八六」（1925 年 12 月 9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800，微捲號：304；「第六五號」（1925 年 12 月 11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800，微捲號：325。

乏地方支持的郭松齡再邀其出山。¹³³ 因此，雖然熙洽大力反對，但張安排後路後，仍決定再戰。至於吳俊陞，雖然他曾於 12 月 5 日暫停南進中的援軍，但並未召回在前線的部隊。其後更於齊齊哈爾公開閱兵，並與文武官吏、商會、記者等見面，聲言維持省內秩序。至 9 日，吳氏穩住省內情況後，才繼續派遣增援，並於 14 日出發往前線。¹³⁴ 兩人在連山戰敗後表現消極，但隨即於張作霖與日協議後改變態度，可見兩人如何重視日本是否援張。

蘇俄在郭松齡事件前後在華北及滿蒙的活動比日本更全面，其潛在影響亦更深遠。蘇援改變了華北軍事平衡，讓國民軍得以迅速壯大，亦令國民軍得以在貧瘠的西北維持。蘇聯在該年向中國輸入軍火的數量是 1917 年段祺瑞向日購械、1921 年直系從意大利輸入軍火以來數量最多的一次。¹³⁵ 若無蘇援，以國民軍（基本兵力 2 師 4 旅，且無兵工廠）之力根本不足以抗奉。至於蘇俄使節、顧問與共產國際代表在華謀略，前面已詳述。在 1925 年，馮玉祥的策略一直與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與加拉罕的建議相吻合（如分化奉軍、聯絡直系等），蘇俄亦承諾於馮、張開戰時向奉施壓。中共亦曾參與策反郭松齡，而由蘇聯扶植並提供武器的內蒙人民軍則協助國民軍進攻熱河。

現時，尚無證據證明蘇聯直接策劃郭松齡事件，但事件發生後，蘇俄即積極利用之。事件期間，蘇聯在邊境調兵、中東路拒運黑軍、中共亦嘗試與國民黨合作組織民軍在東省起事，馮玉祥則以蘇聯資金援助郭松齡，並以軍隊為其後援。這些動作均影響了張作霖在東北的主要夥伴——吳俊陞與張作相的態度。連山一失，吳俊陞與中東路特別區長官張煥相均已動搖。在蘇俄壓力下，他們確有可能

¹³³ 「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459-1460，《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第三九號」（1925 年 12 月 10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800，微捲號：320；川越總領事，「第四一號」（1925 年 12 月 11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800，微捲號：324。

¹³⁴ 「第三二號」（1925 年 12 月 9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800，微捲號：273。

¹³⁵ 陳存恭，《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 8 年至 18 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年），頁 132-136；Anthony B. Chan, *Arming the Chinese: the Western Armaments Trade in Warlord China, 1920-1928*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2).

為保黑省而放棄援張，召回黑軍。黑省一失，吉林亦勢必保持中立，屆時奉張將失去三分之一的步兵與幾乎所有騎兵，令奉軍處於數量劣勢，亦失去戰術彈性，使其難以在關鍵的遼河會戰中發動反擊，擊潰郭軍。正如郭大鳴承認：「先兄素不重視騎兵，吃虧很大」。足證騎兵在此役之重要性。¹³⁶ 只是由於關東軍援張，終令張作相、吳俊陞兩人決心抵抗，因此扭轉了戰局。由此可見蘇俄介入，對戰局的潛在影響，實與日本不相伯仲。

二、張勝郭敗的軍事因素

（一）郭軍目標不清、進退失據

本文認為，除日、蘇兩國干涉外，郭氏失敗的軍事因素不可忽略，特別是郭氏在戰略上的失誤。張、郭雙方的目標選擇與實行決心是兩軍勝負關鍵。郭松齡起事草率，初則計劃突襲瀋陽，失敗後則在嚴寒中窮追奉軍，企圖一舉將之擊潰，結束戰爭。突襲計畫流產時，郭已向守田福松表示願意妥協。連山勝利後，郭又突然不肯妥協，更於日人面前一面表現強硬，一面不斷派殷汝耕等向日示好，態度之搖擺可見一斑。郭出關後，為防範馮玉祥及奉軍殘部，沿途分兵至京奉路沿線各城；連山勝利後，更掉以輕心，分出五分之一兵力回頭防守山海關、連山、錦州等地，再分出一旅占領營口。由於奉張的戰略重心在瀋陽，占領上述地區根本不能使奉張就範，反令郭軍在遼河戰役中處於數量劣勢。關東軍參謀部直指郭氏在遼河戰役期間表現畏首畏尾，既不敢離開鐵路線，讓自己與擔任主攻的右翼失去聯繫，更於初戰失利後即出走。齊世英亦認為，如郭軍能堅持一兩日，待馮軍進入天津（馮軍於 24 日入津），郭軍可能有足夠時間與日妥協，扭轉戰局。¹³⁷

相反，奉張雖受重壓，亦有暗中安排退路，但他一直在表面上堅持抵抗，每天公開露面，向軍官、瀋陽駐軍、警憲及新編部隊講話，表明決心。¹³⁸ 張學良面

¹³⁶ 司馬桑敦等，《張老帥與張少帥》，頁 254。

¹³⁷ 「張郭戰ニ於ケル支那軍隊ニ關スル諸觀察並本戰亂ニ關スル聯諸問題」（1926年3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1506-1507，《陸軍省大日記》，JACAR藏，檔號：C03022778300；齊世英著，林忠勝記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頁60。

¹³⁸ 「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年3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1261-1262，《陸軍省

郭不成後亦表示堅決抵抗，並親臨前線指揮。與郭軍相比，奉系領袖目標明確，為勝利打下基礎。另外，張宗昌和李景林在奉系危急關頭之際頑抗國民軍，讓馮玉祥始終不能與郭聯繫，亦為奉軍勝利之一因。

（二）張軍策略成功

與進退失據的郭松齡相反，奉系於開戰不久即以山海關—錦州—遼河三個階段有序抵抗，並立即放棄熱河，將全部兵力往錦州集中。連山戰敗後，奉軍又將主力集中於瀋陽城外。此策利用奉省縱深，迫使郭軍在嚴寒中不斷追擊，藉此削弱郭軍。奉軍集中兵力，使其得以在遼河戰役中享有 10% 以上的兵力優勢（40,000：45,000）¹³⁹，更有餘力採取攻勢，合圍郭軍。遼河戰役時，奉軍一改連山戰役時的做法，主動出擊，使郭軍進攻停頓，更利用黑軍騎兵包抄郭軍，促使本已心存觀望的郭軍部將放棄反張，終令郭軍土崩瓦解。

（三）張軍後勤優勢

奉軍的參謀、後勤體系及物資優勢亦為致勝主因。戰爭期間，奉軍司令部一直掌握各軍位置、協調各軍，並安排後勤。由於奉軍的後方勤務與通訊並未因主力倒戈而瓦解，奉軍其他隊伍（如吉黑軍）雖然一時出現混亂，卻終能恢復秩序。例如，張軍騎兵軍於郭軍倒戈後始終和奉天保持聯絡，最終避開郭軍追擊，全數加入遼河戰役。¹⁴⁰ 同時，奉天軍械廠、糧秣廠和被服廠亦日夜趕工，由兵站將物資分發至前線，使前線奉軍械彈充足。¹⁴¹ 奉系地方機構亦不斷徵召保甲、調動員

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關東廳電」（1925 年 12 月 6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400，微捲號：208；「奉天二七五」（1925 年 12 月 7 日），收入《日本外交文書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大正 14 年（1925 年）第 2 冊下卷，頁 858；鄭殿起，〈郭松齡反奉經過〉，《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第 2 卷，頁 290；周大文，〈郭松齡反奉時張學良應變見聞〉，收入《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頁 315。

¹³⁹ 姚東藩，〈郭松齡反對奉張東軍見聞紀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 20-22；「張郭戰ニ於ケル支那軍隊ニ關スル諸觀察、並本戰亂ニ關スル聯諸問題」，頁 1729。

¹⁴⁰ 有關騎兵軍表現，詳見「張郭兩軍作戰經過」。

¹⁴¹ 詳見「張郭戰ニ於ケル支那軍隊ニ關スル諸觀察、並本戰亂ニ關スル聯諸問題」，頁 1831-1832、1880-1881。

警、搜羅糧秣，使第三方面軍得以迅速重建。奉軍擁有大量禦寒衣物及食物，與缺乏物資的郭軍形成鮮明對比。¹⁴² 當時，郭軍士兵在寒冬中仍穿秋裝，而且彈藥糧食皆缺。¹⁴³ 連山戰役前，郭軍大量投誠，即因為士兵不能抵禦 12 月 2-3 日間的大風雪。郭軍在遼河戰役中幾乎一觸即潰，亦可歸咎於給養與禦寒衣物之不足。

伍、結論

1925 年的郭松齡事件是 1920 年代東北亞地區地緣政治衝突的一環，對華北政治有重大影響。近年有關此役的史料大量湧現，實有必要從各方面重新審視此役。本文認為，郭松齡事件可算是蘇聯在華謀略的間接結果，而日、蘇兩國政府及在華機關在事件中均嘗試影響局勢，以達致各自的戰略目的。事件發生期間，關東軍、關東廳、滿鐵以及奉系達成協議，派員警至條約規定範圍外駐守，關東軍更於政府同意前越權劃定並無條約支持的非軍事區，迫使張、郭雙方分別對日本作出重大讓步，只是由於張作霖食言，關東軍藉此戰擴大日本影響力的計畫最終失敗。奉天總領事吉田為提升日本戰後影響力，企圖仲裁雙方，並要求政府用軍事壓力迫雙方就範。東京政府則猶豫不決，先決定中立以免中國出現反日情緒，後又因擔心戰鬥影響僑民而增兵東北，變相聲援奉張。雖然蘇聯與郭松齡、馮玉祥和國民黨等的目標並不一致，而且在戰時亦沒有派兵參與戰鬥，但亦明顯企圖影響事態發展。蘇聯自 1925 年對國民黨、馮玉祥和國民軍的援助以及它在郭松齡事件發生期間的動作，均對戰爭的結果有潛在影響。只是由於奉軍勝利並入關逐

¹⁴² 姚東藩，〈郭松齡反對奉張東軍見聞紀略〉，《郭松齡反奉見聞》，頁 20；「奉天第二九一」（1925 年 12 月 11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800，微捲號：327；「張郭兩軍作戰經過」（1926 年 3 月），〈張郭戰史送付ノ件〉，頁 1267、1275，《陸軍省大日記》，JACAR 藏，檔號：C03022778300；「奉天二八一」（1925 年 12 月 8 日），〈反奉〉，第 1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8600，微捲號：279；廖安邦，〈郭松齡反奉側記〉，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22 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年），頁 37。

¹⁴³ 「錦州情報報告二關スル件」（1925 年 12 月 16 日），〈反奉〉，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9300，微捲號：104；「關東廳電」（1925 年 12 月 19 日），〈反奉〉，第 2 卷，《外務省記錄》，JACAR 藏，檔號：B03050779300，微捲號：79。

走馮玉祥，蘇聯在華北的角色才被遺忘。

可是，事件並不能簡單地歸類為蘇、日兩國的代理戰爭，蓋日、蘇兩國在 1925 年的協定已孤立了張作霖，日本政府本無意援張，只是由於東京未能控制其在華機構與軍人，致令關東軍得以藉採取對張有利的行動以迫使奉張（及郭松齡）對日本作出讓步。不過，即使日、蘇干預，它們對戰爭結果的影響仍然有限。張軍雖然初戰失利，但始終決心抵抗，充分利用奉系的戰略縱深和有利天候，迫使郭軍實施漫長的追擊，前線將領亦於遼河戰役的關鍵時刻中發揮主動性。此役證明了奉軍在後勤和裝備上優勢。這些因素確保了奉張在主力倒戈之際仍能化險為夷。另一方面，郭松齡本人決心不足，以及他在兵力運用和戰略上的失誤，令郭軍失去勝機。

綜觀郭松齡事件的各方面，均證明在民初的戰爭中，處處都有列強的身影，特別是和中國有直接地緣戰略關係的蘇俄與日本。與其後的國民黨一樣，馮玉祥在 1925 年一面得到蘇援，一面以反帝國主義為口號攻擊對手，復一面向英、日等國承諾反共，似比只能以「反赤」和「修約外交」為號召的張作霖占優勢。但論述上的優勢，似不能彌補戰略缺失與軍事失敗。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日本外務省檔案》（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

B02030818800，〈馮露關係〉。

B02030817300，〈支那、蘇連邦外交關係雜纂〉，第1卷。

B03050056300，〈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部〉，第34卷。

B03050057600，〈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部〉，第35卷。

B03050059500，〈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部〉，第36卷。

B03050148500，〈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部／地方〉，第42／3卷。

B03050749500，〈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松本記錄〉，第1卷。

B03050749700，〈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松本記錄〉，第2卷。

B03050777800，〈反奉天派紛擾事件〉，第1卷。

B03050779000，〈反奉天派紛擾事件〉，第2卷。

B03050780800，〈反奉天派紛擾事件／戰政況〉，第1卷。

B03050781800，〈反奉天派紛擾事件／戰政況〉，第2卷。

B03050782900，〈反奉天派紛擾事件／戰政況〉，第3卷。

《陸軍省大日記》（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

C03022778300，〈張郭戰史送付ノ件〉。

C03022775100，〈有關支那時局對策文件〉。

C03022726600，〈北支那軍隊調查ノ件〉。

C03022731900，〈北支那軍隊調查ノ件〉。

中央檔案館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0-1925》（一）。北京：北京圖書館，1997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二十二）。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三十五）。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五十一）。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9 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寧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遼寧文史資料選輯》（十六）。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二）。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

政協遼寧省瀋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瀋陽文史資料》（九）。瀋陽：瀋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 年。

章伯鋒編，《北洋軍閥》（五）。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 年。

薛銓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Kenneth Bourne and Cameron Watt,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FOCP), Part II, Series E, Vol. 29-30.

Robert L. Jarman,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Vol. 5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200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25, Vol. 1.

二、文集、回憶錄、口述歷史

王毓超等，《北洋人士話滄桑》。北京：中國文史，1993 年。

李毓澍訪問，陳孝恭記錄，郭廷以校閱，《戡翼翹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

姚東藩等，《郭松齡反奉見聞》。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

遐庵年譜匯稿編印會編，《葉遐庵先生年譜》。上海：遐庵年譜匯稿編印會，1946 年。

維·馬·普里馬科夫著，曾憲權譯，鄒寧校閱，《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札記（1925-192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1982 年。

齊世英著，林忠勝記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

三、期刊、報紙

《國聞週報》，北京，民國 13 至 14 年。

《晨報》，北京，民國 13 至 14 年。

四、專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 年。

水野明著，鄭樑生譯，《東北軍閥政權研究：張作霖·張學良之抗外與協助統一國內的軌跡》。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王宗華、劉曼容，《國民軍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年。

古蔭孫，《月丑內亂始末記實》。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司馬桑敦等，《張老師與張少帥》。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年。

沈 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沈志華、楊奎松等，《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 年。

草柳大藏，《滿鐵調查部內幕》。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

楊天宏，《政黨建置與民國政制走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劉敬忠，《國民軍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錢公來，《東北史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 年。

薛銓天、金東吉，《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1917-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年。

Atwood, Christopher P.,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Leiden; Boston: Brill, 2002.

Chan, Anthony B., *Arming the Chinese: the Western Armaments Trade in Warlord China, 1920-1928*.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2.

Elleman, Bruce A.,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7*. Armonk, N.Y.; London: M.E. Sharpe, 1998.

Erickson, Joh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1918-1941*.

London: Frank Cass, 2001.

Kwong, Chi Man, "Character and Circumstances: Wu Peifu and the Second Zhili-Fengtian War."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8.

McCormack, Gavan,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Folkstone, Kent: Dawson, 1977.

Sheridan, James,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Waldron, Arthur,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五、期刊論文

毛覆平、王關興，〈郭松齡事變的性質及其失敗的原因〉，《學術月刊》，第5期（1982年）。

張安慶，〈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初探〉，《武漢大學學報》，第4期（1983年）。

杜尚俠，〈試談郭松齡反奉的性質〉，《東北地方史研究》，第3期（1985年）。

顧明義，〈郭松齡事件與日本〉，《日本研究》，第4期（1986年）。

高紅霞，〈郭松齡倒戈失敗剖析〉，《學術月刊》，第12期（1987年）。

丘權政，〈郭松齡聯合馮玉祥倒戈反奉及其失敗〉，《東北地方史研究》，第2期（1989年）。

王雅文，〈郭松齡與張氏父子〉，《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1995年）。

萬家星，〈為郭松齡辯〉，《社會科學戰線》，第3期（1999年）。

季 鵬，〈日本幣原對華外交與郭松齡事件〉，《民國檔案》，第4期（2006年）。

張蕾蕾，〈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軍事史研究綜述〉，《軍事歷史研究》，第2期（2003年）。

楊雨青，〈國民軍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近代史研究》，第3期（2003年）。

楊雨青，〈國家利益：蘇俄對在華合作者的選擇〉，《歷史研究》，第4期（1999年）。

楊天宏，〈國民黨與善後會議〉，《近代史研究》，第3期（2000年）。

王 斌，〈試論國奉戰爭中的天津之戰〉，《軍事歷史研究》，第1期（2008年）。

唐啟華，〈1924-1927年中俄會議研究〉，《近代史研究》，第4期（2007年）。